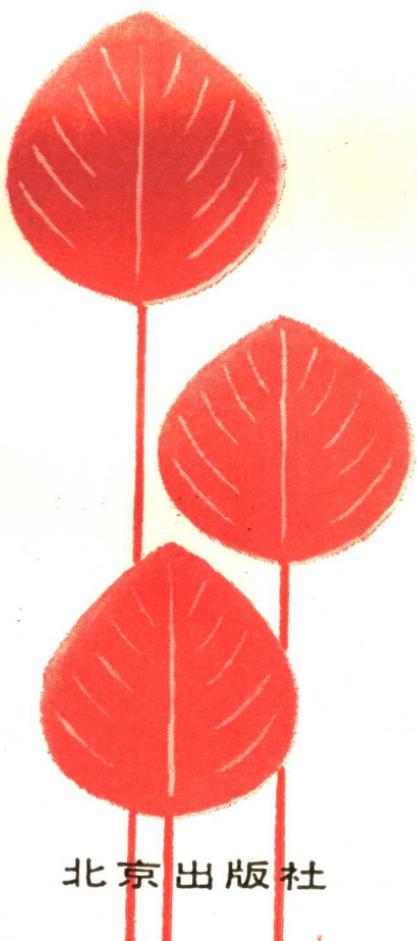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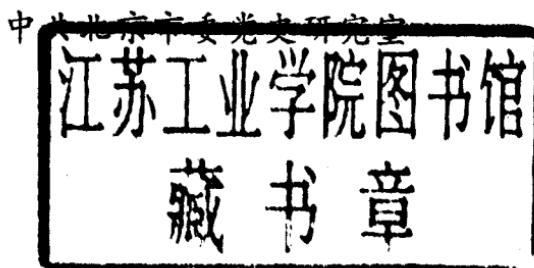
北京革命历史回忆录



北京出版社

北京革命史回忆录

(第二辑)



北京出版社

北京革命史回忆录

(第二辑)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389,000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

ISBN 7-200-01526-1/K·140

定价：6.30元

前　　言

北京革命史，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北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最重要的传播阵地之一，也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抗日战争、北平和平解放等等都发生在北京。因此，北京革命史料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种类多、数量大、内容极其丰富。

为了保存史料，向学习和研究北京党史、北京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读者提供资料，教育后人，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一套《北京革命史回忆录》。共分为四辑，约150万字左右。第一辑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19年5月—1927年7月）；第二辑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7月—1937年7月）；第三辑为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第四辑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

本辑为第二辑，共收入78篇回忆文章，其中有55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作者都是历史见证人，他们以个人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从不同侧面或片断追忆记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内容广泛、具体，涉及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北京人民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同新旧军阀的英勇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北京人民开展的抗日斗争、“一二九”运动等。文字生动活泼，事件、人物、情节叙述细腻，栩栩如生，读后犹如身临其境，感染力强。尽管由于事隔多年、囿于记忆，难

免出现一些人名、地名、年月日、具体情节上的不一致、差错或不完全精确有待订正，但并不影响对历史本质的反映。由于这些文章是来自历史见证人的第一手史料，记述了一些文献资料上所没有甚至不可能有的历史内幕，可以作为对文献资料的补充。因而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它是党史工作者、高等院校和宣传教育部门研究北京党史、北京现代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的重要史料，也是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在编辑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原文全貌，个别进行了节录。文章编排以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先后为序，按专题集中。个别文字改动、错字订正，均以编者注释说明。漏字以□号标明。作者回忆时间和原文出处，在篇后()内标明。凡未收入本辑的该时期的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目录，统一附录在第四辑后面。参加本辑选篇工作的有段丽欣、马春玲、赵秀德、谢诚。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1991年1月22日

目 录

- 大革命失败后北京大学党组织概况 胡曲园(1)
关于刘少奇同志视察北京大学党支部的回忆 傅于琛(4)
中共北京临时市委的成立及被破坏的经过 张友渔(7)
20年代我在北平做过的几件革命工作 宋日昌(12)
1929—1931年北平党团组织活动回顾 雷任民(15)
我在北平的10年 冀丕扬(20)
1930年前后北平党的一些情况 吴化之(28)
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北方党组织的状况 刘亚雄(32)
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与北平天津党组织 曹 策(34)
30年代初北平地下党斗争片断录 杨纤如(37)
白区工作局部情况的回忆 马辉之(46)
我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 平杰三(60)
我所了解的北平团组织的情况 曹 策(68)
我走向革命的回忆 张 苏(73)
30年代初期的北平共青团 武 光(77)
1931年北平共青团地下活动的一段回忆 王秋亭(86)
北平革命互济会的早期活动 杨秀怡(90)
我与互济会的关系 于仁洲(95)
北平互济会的一些情况 王乃天(98)
我在互济会中做的几项工作 王 钢(106)
北平地下斗争片断 刘斐章(111)
“九·一八”事变前后到抗战开始时期一些情况的回忆 王一夫(118)

1930年“五一”纪念大会前后	袁 静(123)
北平“四·二〇”事件及其它	陈志安(126)
我在北平工作的片断回忆	郝德青(130)
三次被捕前后	胡泽民(134)
1930年北平“八一”游行示威的一些情况	王黎夫(140)
1930年我党在北平与反动派的一次斗争	万九河(146)
我参加北京市委工作的回忆	黎 玉(150)
关于“北平左联”	刘尊棋(152)
我所了解的北平左翼文化运动	张磐石(154)
北平革命活动回忆	李长路(164)
我在北平入党前后的一些情况	唐守愚(169)
回忆我在“北平社联”的日子	李正文(173)
我所了解的“北平社联”的组织与活动	宋劭文(184)
“九·一八”前后河北党团的组织情况和北平的青年运动	王 德(187)
1931年前后北平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情况	顾卓新(192)
1930—1934年清华地下党的组织及活动情况回忆	陶瀛孙(199)
1931年9月至1933年1月北平党的组织及活动情况	刘瑞森(204)
我参加北平市委的一个月	刘宁一(209)
大众书局与《北方红旗》	李 梨(212)
关于清华“社联”和北平临时工委的一些情况	牛佩琮(216)
1935年5月北平地下党被破坏的经过	黄 云(220)
我在北平工作的回忆	刘 杰(223)
1930—1932年北平团的组织及活动情况	于致远(227)
1932年北平团组织的一些情况	王兴让(230)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卧轨斗争及南下示威运动的回忆	李时雨(233)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南下请愿斗争	薛迅(246)
回忆南下请愿	李正文(264)
回忆北平斗争往事	梁明(268)
我在北平工作的两年	林里夫(273)
“剧联”北平分盟战斗的一年	于伶(287)
回忆“北平剧联”的几次演出	邸力(298)
回忆北平剧联时期的戏剧刊物	魏照风(302)
两届“北平文总”的一些情况	陆万美(305)
我在清华大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	高承志(311)
1933年在北平	李华生(317)
《泡沫》碎屑、《浪花》点滴	碧野(324)
入草岚子监狱前后	杨献珍(327)
我在北平工作和被捕的回忆	关文彬(341)
狱中斗争纪实	黄素心(343)
狱中学习回忆	丁铿(349)
回忆“一二·九”	宋黎(354)
“一二·九”运动回忆	张学文(393)
从低潮走向高潮——回忆北平的地下工作	梁寒冰(403)
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党的领导	郭明秋(409)
我所了解的“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市委的一些情况	高锦明(419)
1936年1月至1937年1月中共北平党组织及其活动情况	李雪峰(433)
1936年4月至12月中共北平市委的组织简况	李葆华(440)
从共青团北平市委到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	张滨黄(443)
我所了解的北平民先队	孙陶林(448)
关于北平文艺青年救国会的建立及其前后	刘御(452)
北平市妇女问题研究会情况点滴	刘光远(455)

回顾“三·三一”抬棺游行	葛佩琦(458)
难忘的往事	汪一净(464)
北平晋绥代表团赴绥劳军记	梁寒冰(471)
投笔从戎卫社稷——记北平学联向太原输送革命力量的经过	陈振中(473)
我在北师大党支部和赴延安参加党的代表会议的一些情况	林一山(477)

大革命失败后北京大学党组织概况

胡 曲 园

(一)

我和爱人陈珪如都是1927年加入北京大学党组织的。当时北大只有一个党支部，下面约有近10个党小组，支部书记是杜宏远（解放后在郑州大学教书，已故），下设组织干事、宣传干事2人（人员常有变动）。这年暑期大约有近百人（包括我和陈珪如）参加党组织。但是到了秋季白色恐怖加剧，很多人就脱离党组织了。到年底，大约从100人减少到30人左右，而且党小组也不能按期活动，呈现出瘫痪状态。原因是10月间北京党组织遭到了第二次大破坏（第一次是李大钊等同志被捕），市委书记李渤海叛变，出卖了全体市委成员，王平阶、彭树群、王光临等10余人牺牲。这次市委被破坏后，党又成立了新的市委，由马骏（回族）任书记。但不过两三个月，也全被逮捕。

1927年4月以前，学运的纲领是联左批右，宣传三大政策，准备迎接北伐胜利。所谓“联左”，就是联合国民党左派并不发展左派；所谓“批右”，就是批判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当时北大学生会主席是陈允中。党组织一方面通过学生会向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是成立了北大平民夜校，对北大印刷工人以及其他职工进行宣传教育。同时，对附近地毯厂的工人以及黄包车夫、粪夫也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目的都是为了组织力量迎接北伐。

“四·一二”蒋介石的大屠杀引起了党内的极大愤慨。北京党组织打算对反动统治阶级作武力的答复，准备向公安局夺取枪

枝，进行武装暴动。但因机密泄露，就发生了全体市委被捕、李渤海叛变的事件。由于市委连遭破坏，组织陷于瘫痪，校中又密布包探，右派学生进行告密，所以很多人纷纷脱党了。

据我记忆，1927年冬，党内仍有暴动打算，但亦未实现。

(二)

到了1928年，这时北大在校同志一方面因许多同志牺牲而感到悲痛；另一方面由于革命失败而感到惶惑。为了认清革命的前途，大家都感到有学习革命理论的必要。当时俄文书在北京虽无法买到，可是日文书却容易买到，《资本论》和马恩全集都有出版。于是同志们转向革命理论的探讨，而且兴趣极高，纷纷成立读书会之类的社团组织。和女同志谢冰莹、陈珪如和齐淑容等成立了地球社，并出版了小册子。男同志于学习、探讨之外，也有燕山书店的筹备，但终因经济困难和政治压力未能实现；后来只用燕山书店名义出版了一本由傅烈（即傅金耀，又名傅于琛）翻译的《社会主义进化论》。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革命低潮时期。

(三)

1928年下半年，北大党支部虽已恢复，但很多同志仍愿游离在党外，因为一提到恢复组织，就有一种惨痛的味道。

1929年初，刘少奇同志来北大，鼓励恢复组织，说我们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是不孤立的。当时第三国际的威信在同志中还很高，刘少奇同志视察后，党组织逐渐活跃起来。这年冬，陈潭秋同志也来过，在孙晓村同志家和几个同志谈过话。

当时陈启修、许德珩在北大讲学，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

1930年，国民党军阀酝酿内战，此时革命空气特别活跃。

这年2月，北京成立了反帝大同盟，由冀一夫负责领导。后来胡锡奎又在北京组织了文化运动大同盟，在北大第二院开会，各校都有人来参加。反帝大同盟曾在天桥搞飞行集会，一些同志被捕。

4月20日，党为了筹备纪念“五一”劳动节，在米市大街教堂举行大会。会议主席是肖中真，他讲话不多。北京工大学生徐崇林讲话较长。会后示威游行，当时正是阎锡山和冯玉祥同蒋介石作战，我们的示威口号是“反对军阀内战！”“打倒刮民党！”游行队伍被侦缉队包围，大约有60人被捕。我和陈珪如、傅金耀、冯仲云、陈志安均被捕。肖中真受刑最重，其他同志也都轻重不同地受刑。我们被阎锡山拘捕半年之后，阎、冯作战失败，由于蒋介石勾结张学良抄了阎锡山的后路，阎仓惶逃出北京，只得将被捕人全部释放。

当时北京市委的领导人是谁，我不清楚。只知在出发到教堂开会之前，曾有一个朝鲜人李××到北大二院召集党员开会，要每个党员负责邀约4个群众一同去参加示威。另外有一个名叫肖明的同志（留法学生），似乎是市一级的干部，常来北大找党员谈话。

（1982年9月24日回忆，原载《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2月，总5期）

关于刘少奇同志 视察北京大学党支部的回忆

傅子琛

那是1929年初春的一天。早晨8点上课的钟声刚刚敲过，刘少奇同志在胡锡奎同志陪同下，来到位于景山东街的北京大学第二院西边的“西斋”宿舍元字第一号房间。这个房间是当时北大党支部书记李光伟同志的宿舍。我清楚地记得，那天胡锡奎同志戴着一顶旧雪帽，少奇同志则身穿蓝布长衫，颈缠深灰色长围巾，足穿黑色平底布鞋。参加会议的除李光伟外，还有喻德渊（支部组织干事）、文艺陶（支部宣传干事）和我（支部文化教育干事）。

胡锡奎同志当时任何职，我不清楚，只知是上级党组织负责人。他首先介绍说，少奇同志是党中央派来北方视察党务的，今天来参加北大支部会议，请大家汇报一下情况，提出一些问题，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

支部书记李光伟汇报了支部工作情况。他说，北大党支部在1927年4月前，有近100名党员。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及李大钊同志被捕牺牲后，反动势力十分嚣张。夏季，张作霖的军警包围学校，大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学生，使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直到1928年，分散各地的同志陆续回来后，党组织才逐渐恢复。到目前为止，恢复组织生活的共有几十名同志。支部没有开过全体会议，而是分成几个小组，互不牵连，分别在学生会、平民夜艺、后门地毯厂以及校工、人力车工人中进行宣传，联系群众。在此期

间，输送一些同志去陕北榆林及冀南保定一带去当中学或师范学校的教员，做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另外，还选派了几位革命斗争性比较坚定的同志，到南方参加军事学习或从事武装斗争区域的工作。

李光伟汇报后，组织、宣传两位干事作了补充发言。

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不少同志中出现的彷徨失望等消极倾向，结合我个人的体会谈到，知识分子必须加紧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以提高在政治上识别国民党改组派及其他政治团体与共产党的区别，坚定自己的革命信念。我表示赞同当时出现的赶学日文，钻研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等社会科学的学习热潮。

我们在发言中还反映了当时在工作中和同志思想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对群众工作和学生会工作抓不住要领，感到力量分散、单薄，有畏难情绪；一些同志甚至还有恐怖情绪；在革命和个人出路问题上，还有糊涂认识；等等。

少奇同志听了我们近一个钟头的汇报之后，用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对我们讲话。

少奇同志首先肯定了北大党支部恢复组织的工作成绩。他说，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有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是为中国人民得翻身、求解放而战斗的，因此我们得到人民的支持。一切穷苦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都是我们革命的社会基础。在国际上，我们也有第三国际、苏联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和援助，因此我们党并不孤立。他指出，国民党背叛革命以来，它一方面加紧反共，一方面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它同各地方新旧军阀争夺地盘的内战一直不停。反动派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迟早要垮台。他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民主革命十大纲领，我们的总任务仍然是反帝反封建。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党的总路线要求我们深入到广大工人、农民、士兵及学生中，进行艰苦的工

作。他强调指出，我们党不同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投机取巧、为个人名利地位找出路的政治团体，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有坚定的革命性和组织纪律性。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要讲究“技术工作”，这就是无论对内联系还是对外活动，都要注意不泄露机密，不能对反动派暴露自己的身份。在社会运动中，不能盲动，事先要有情况了解，有准备，防患于未然。要认真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反对国内外剥削阶级和反动派的斗争中，要讲究科学方法。少奇同志最后说，我们要认真学习社会科学，学习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树立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要克服个人的感情冲动，培养维护组织、团结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要通过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研究，正确地分析阶级斗争和政治形势，扫除一切迷信和盲从的思想。要积蓄力量，积极准备，创造条件，支援南方土地革命，并把北方工作开展起来。

少奇同志大约讲了四五十分钟。他的语调坚定、有力而亲切。他的讲话为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使我们倍受鼓舞。

1957年少奇同志陪同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来上海访问。在机场上，当少奇同志走到我面前握手时，我扼要提起他当年到北大党支部视察的事情，讲了他那天穿的服装和讲话要点，少奇同志听了连连点头说：“记得起。”

最后，我想以4句感言再次表达对少奇同志的深切怀念，并作为我的这篇回忆文章的结束：

一贯忠贞为革命，
党群学习记在心；
品德教人肝胆照，
事迹永存励人民。

（1982年3月27日回忆，原载《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2月，总5期）

中共北京临时市委的成立 及被破坏的经过

张友渔

1927年6月，我经北京市委委员、西城区委书记盛志权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我所知当时的市委书记是李渤海。我入党后，经常在盛志权的领导下工作，也参加过李渤海直接召开的党的干部会议。我的主要工作是为我党办一份合法斗争的报纸——《国民晚报》。当时还有《新声晚报》也是我党办的合法斗争报纸，由彭芳草负责，由于刊载的内容比较左一点，不久就被迫停刊了。这样，我党掌握的报纸就只剩下《国民晚报》了。《国民晚报》公开发行，它过去是国民党左派办的，后来才转到我们手里。那时我们办报人很少，只有我和陈显文、武新宇等三四个人。有一个负责事务的工作人员，又干会计，又干庶务，又干收发。报纸由外面的印刷厂印。我们的报馆设在宣武门外茶食胡同一个很小的院子里。这个院子，正院是房东住，偏院有两三间房是报馆。我住在宣武门外的灵石会馆，离报馆很近，那时我没有家，只我一个人。

在我办《国民晚报》期间，市委经常派交通罗采五（已牺牲）、谢××（朝鲜人，名字记不清了）和我联系。他们把一些需要宣传的指示给我带来，我把搜集到的情报交给他们。除办报外，我还参加过几次市委召开的会议，这些会议都是李渤海直接召集的，范围比较大一些。因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开会十分秘密。其中有几次会议是在胡鄂公家召开的。胡鄂公是我党的秘密党员，他曾当过国会议员，是老研究系的，很有地位，因此在他

家开会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他家在地安门慈慧殿，家里有一所大房子，我到他那里参加过几次会。那时我们还常参加党组织的飞行集会、示威游行。游行用的纸旗子都是我们自己做的。现在看来，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厉害的情况下，不是隐蔽精干，反而组织少数党的骨干上街游行集会，确实是一种“左”的冒险行为。

大概在10月间，以李渤海为首的市委遭到破坏。被破坏的具体原因和经过我不太清楚，只知在这次破坏后，同我有联系的盛志权、罗采五两同志牺牲了。市委遭到破坏后，一时组织关系断了，主要靠自己的工作，我还是继续办《国民晚报》。

约11月间，党中央派谭峭云（湖南人，又叫戴晓云，有时又叫老张）、马骏来北京重新恢复党组织。他们来京后就着手筹备市委，先后找到我、胡鄂云（化名吴南湖）、尹如山（或叫尹如海，可能是朝阳大学学生）、许锡仁（燕京大学学生）等人，让我们几个人参加市委的筹备工作。为了便于工作，我们设立了一个秘密机关。房子是胡鄂公找的。胡鄂公和日本共产党员铃江言一（他当时的中国名字叫王子敬或王子文，曾写过一本书叫《中国革命和反革命》）有联系，通过他在崇文门盔甲厂一带给我们租了一间日本式的房子。这个地方在使馆区附近（当时叫保卫界），住的多数是外国人，中国警察管不着。马骏、尹如山、许锡仁等人住在那里，又找了个秘书（叫崔宗培）也住在那里，负责一般技术性的工作。谭峭云住在他岳父家，地址在宣武门外南横街（或南半壁街），他岳父是旧财政部的司长，有掩护条件。我还是住在我办报时住的地方。

筹备市委的工作很多，需要经常开碰头会。开会地点有时在马骏的住处。为了防止暴露，有时就改在饭店、饭庄、澡堂或公园里开。记得我们在东长安街的中央饭店或长安饭店，由马骏以大商人身份开房间开过几次会。当时，除北京饭店外，这两家饭店是最大的。那时的饭庄设有雅座，一般顾客不能进去，我们在那里边吃